

在功利与唯美

之间

“在功利与唯美之间”，
表达了我对文学艺术的一
种基本看法。我反对文
学艺术上的急功近利，
也拒绝文学艺术上的“唯美

Wang Binbin Zhu

王彬彬 著

主义”。我以为，文学艺术，应该在功利与
唯美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我反对把是否能传世作为衡量当代文学
的最高尺度。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
任何时代的“当代文学”都具有不可取代
的价值，任何一部“当代作品”都具
有一种意义。

火鳳凰

巴金

●(沪)新登字 113 号

总体策划 陈思和 王晓明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扉页题字 巴 金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书 名 在功利与唯美之间(“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作 者 王彬彬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7,000

国际书号 ISBN7-80616-190-2/I·69

定 价 14.00 元

写在前面

我知道，这年头，像我这样的人，要干干净净地出一本并不会畅销的书，可真不容易。当我被告知上海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将收入我的一本论文集时，我便不得不对丛书的总体策划者陈思和、王晓明二位先生怀有一份深深的感谢。我感谢他们为我出一本书，更感谢他们让我干干净净地出第一本书。

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就从陈思和先生那里得到过许多帮助，所以，在这里，我尤其要对陈思和先生表示谢意。

这里收录的 20 篇文章，是从我已发表的百余篇习作中选出的。“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表达了我对文学艺术的一种基本看法，所以以此为书名。我反对文学艺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拒绝文学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我以为，文学艺术应该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我以为，文学艺术上急功近利与“唯美主义”看似尖锐对立，其实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当然，要把这问题说清楚，须费许多笔墨。《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与《为艺术而艺术：艺术

的自卑与自恋》两文，是我对解说这一问题所做的尝试。

文化人与当下社会的关系问题，知识者在当下社会中的精神状态问题，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中怎样安身立命的问题，是近年学术文化界普遍关心的。收在“当代知识者精神状态研究小辑”中的几篇文章，是我对这类问题的一些初步想法。

在这本集子中，我把几篇文章单独列出，设置一个“重写文学史小辑”，表示我对“重写文学史”这一提法和做法的赞同。这一辑中关于何其芳的《良知的限度》一文，是当时应《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之约而写的。在这本集子中，这篇文章写得较早，但却仍然是书中最值得一读的文章之一，——发现这一点，真让人有些沮丧。

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有“方法热”与“观念热”，有西方理论方法的洪水般的涌入。文学批评的变化，其实质是什么？“方法热”与“观念热”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又实际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中国文学批评真正面临的问题在哪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必要进行一番反思、清理。“批评的批评小辑”中的几篇文章，是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还有必要提到《当代文学为何必要》一文。这篇文章，主旨在于反对那种以是否能传世作为衡量当代文学的最高尺度的做法，在于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当代文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是指允许有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在于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任何一部当代作品都具有一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当代作品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品就不妨平庸、浅薄。幸勿误会。

在编选这本集子时，我尽量标出了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和原发表刊物。这是一份纪念，更是为了对文章写作时的学

术氛围进行一种提示。弄清一篇文章是在怎样的一种精神气候中写成的,对于理解、评价一篇文章,决非无关紧要的。

最近几年,我还写了不少或长或短的、针对当前某种文化和文学现象进行尖锐批评的文字,引起一些人的憎恶、痛恨,并因此说我只会“骂人”,“却写不出几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编选这本集子时,我特意把这类文章基本排除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类“骂人文章”就真的没有价值。我希望能有机会把这些文章集在一处出版。

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提到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1986年,我作为一名非中文系出身的、文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修养都很差的考生,报考了潘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居然被录取(事后我得知,潘先生在我与另一名考生间权衡了好几天,才最后决定取我)。当我硕士阶段尚未结束时,潘先生又让我提前免试进入博士阶段。在潘先生门下的6年间,受益之多,自然并非一个谢字了得的。

1995年5月16日紫金山下

总 序

徐俊西

思和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 he 已得到某企业家朋友的一笔赞助，准备建立基金出一套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并要我写篇短序。高兴之余，只得从命。

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在“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真诚和抱负，都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

首先，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科学确是首当其冲的。所谓文人下海，学术消沉，大腕横行，士将不士，着实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忧虑。然而仔细一想，事情也并非果真这样糟。从大处着眼或长远一点看，经济搞上去了，文化迟早也一定会上去的。就譬如“火凤凰”这套丛书的出版，如果没有经济大潮，就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没有那么多企业家，哪有人出钱赞助出版。所以我总觉得，当前的文人学士对于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中那些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也不要过于大惊小怪。这里除

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做到“坐怀不乱”外,还要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宽松心态来看取繁华人生,相信在商海的沉浮中能够到达彼岸的除了物质文明之外,也必定会有人类的精神文明,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下定决心,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游过去。

其次,所谓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要言之,就是要弘扬人们在研究人文科学中长期形成的那种追求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睿智的科学心态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大家知道,从真正宏观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还仍处在极不完善的初始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一定会比我们指出前人的错误更多得多。因此对于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实在任重而道远,如果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是很难胜任的。而且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始终把自己研究的坐标定位于人类价值的最终实现上,因而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要以批判的和超越的目光来审视现实,构想未来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和理论特征。不言而喻,这种定势和特征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自知之明和社会宽容将是何等的重要和突出!别的姑且勿论,就以这套旨在“发扬上海地区文学批评优势”的丛书来说,作者们所崇尚的新批评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在我国当今的文坛上究竟能获得多少知音就很难逆料,更不用说要得到其他各界人等的认同和接受了。但是不管怎样,在当前日现荒疏和浮躁的文艺批评领域里,有一群甘于寂寞的青年学子坚守岗位,不惮驰驱,并大有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气度,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以上就是我由这套丛书所引发的一点感想和议论,言不及义,是谓之序。

目 录

徐俊西

1	总序
1	写在前面
	当代知识者精神状态研究小辑
3	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主体定位
20	“中产阶级气质”批判 ——关于当代中国知识者精神状态的一份札记
31	当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小辑
47	仿效与创新 ——毕加索的启示
55	雅俗共赏：一种美学上的平均主义
70	在功利与唯美之间
89	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卑与自恋
95	重提小说的“认识价值”

——米兰·昆德拉的启示

当代文学研究小辑

- 107 当代文学为何必要
——对一种检当代文学的尺度的检验
- 117 当代文学中两种价值的对立与互补
- 128 李杭育论
- 153 醉与笑
——朱苏进论
- 168 余华的疯言疯语
- 168 悲悯与慨叹
——重读《古船》与初读《九月寓言》

重写文学史小辑

- 199 良知的限度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
- 222 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
- 232 名作与价值

批评的批评小辑

- 241 80年代文学批评的“方法热”与“观念热”
- 256 回顾与前瞻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 276 人物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荣辱兴衰

当代知识者 精神状态研究小辑

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主体定位

引 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谈论的是知识者而非知识分子的主体定位问题。虽然知识分子都必然是知识者，但却并非知识者都是知识分子，正如虽然鹰是必然会飞的，但却并非会飞的都是鹰一样。苍蝇是会飞的，蚊子是会飞的，燕雀也是会飞的，但它们都不能算作鹰。

知识者不等于知识分子，其实应该成为一种常识。说一个人是知识者，只是指出他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他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水平，具有某项知识技能，能够从事某项知识文化方面的专业工作，除此之外，什么也未能说明。一个知识者仍然是一个身份未明的人，他在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文化角色，他把自己的双脚放在哪里，仍然有待确证，所以人们有可能、有必要去谈论一个知识者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位。而说一个人是知识分子，便意味着强调他不只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他不但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水平，不但具有某项知识技能，不但能够从事某项知

识文化方面的专业工作，而且他不把自己的文化知识纯粹当作谋生的手段，不把自己的专业纯粹视作某种技能，不把自己的脑力劳动完全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生存方式。一个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自己的思想有一种虔敬，他应该觉得自己的劳作具有某种神圣性，他恪守某种价值，同时依据这种价值对社会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一个知识分子，他能超越于一己的利害和经验而关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生存，他是人文价值的守护者、体现者，他与种种有辱于人的尊严、有悖于真理和正义以及违背他的人文理想的行为做不妥协的抗争。一个知识分子，他是社会的良心。因而，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知识分子时，便已指出了他在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文化角色了，便已显示了他的双脚立于何处了。

一个知识者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位，从来便不只有一种可能。他可以把双脚放在别的位置上，也可以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岗位。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古今中外，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者。当然，在现代，知识者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一方面为知识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更多样选择的可能，同时，却又将知识者通向知识分子的道路挤压得十分狭窄、凶险，又使知识分子的存在变得愈来愈艰难。一个知识者要扮演别的任何角色似乎都更容易更有利可图了，但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则似乎变得更为困难，变得需要有更坚强的意志，更坚定的信仰，更执着的理想。甚至有人说，在现代，做知识分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知识分子死了”。这虽然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但却也确乎道出了现代社会是怎样排斥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一些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危机。在现代，知识分子经受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闷和窒息。知识分

子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境遇，颇有点像中国南方的黄梅雨季，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之中。商业明星、歌星、体育和电影明星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春风得意，成为大众关心、效法、信服、崇拜的偶像，而与此相比，知识分子的声名和影响则逐日下降，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正在被僭越，被取代，大众文化明显正在把知识分子排挤，使知识分子越来越难找到立脚之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5个基本条件正在消失：（1）理性的消失，（2）真理的消失，（3）正义的消失，（4）价值的消失，（5）尊严的消失。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也愈来愈尖锐地表现出来，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在日益变得脆弱。阿多诺指出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正浪潮滚滚，方兴未艾。当代中国的知识者，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给自己定位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者阶层，已经开始了分化和重组，这种分化和重组正在继续着。“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勃兴，知识分子的危机，对于每个民族的知识者都是一种检验。每个民族知识者群体的历史性格和个人操守、信仰、文化人格在这种时候都将鲜明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只就当代中国的知识者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主体定位的几种类型做一种粗略的区分，并试图指出在当代中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和该做些什么。

上篇：当代中国知识者的几种类型

知识者和知识分子这种称谓，虽然无疑有着某种适合于各民族的普遍遍义，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各民族的知识者

和知识分子，又会有着各自独特的品性。因而，当知识分子的危机来临时，当知识者面临重新定位时，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知识者的应对方式，又会有具体的不同。在近年中国，知识者的种种表现，一方面与其他民族，与西方知识者在相似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有共通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又是渊源有自的，是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识者性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和发扬。东汉仲长统说：“天下之士有三贱”：慕名而不知实；不敢正是非于富贵；向盛背衰。这“三贱”在近年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明显地在士人身上表现出来。

当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并没有消失。在当代中国，不愿放弃和仍然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知识者，虽然相对少，但也仍有。

按照中国知识者近年为自己选定的立足点，或许可以粗略地分成几种类型：

1. 传统文人型

蔡翔先生在《文人传统的复活》^①一文中，对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文人立身处世方式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有较详的阐述。蔡文指出，在中国古代，文人是士大夫阶级的复杂构成中一支很难明确界定的旁支。文人对整个士大夫阶级的价值体系，既有认可服膺的一面，又有拒斥背叛的一面。与所谓贤良方正之士相比，与正统的士大夫阶级相比，文人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生存方式，这表现为拒绝对社会的关怀，阻断对意义的追问，得过且好，游戏人间，纵情声色，“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对任何伟大崇高的东西，对任何超凡脱俗的东西，都避之唯恐不及……文人，其实常常是一种犬儒主义者。

照我的理解，文人精神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一种极端的冷漠和自私。中国的知识者，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有着一种文人精神。即使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也未尝不蛰伏着这种传统的文人趋向。鲁迅常感到身上有着传统的毒素，而文人精神或许便是这传统的毒素之一种。只不过鲁迅对自己身上的这种毒素有明确意识，有高度的警惕，他时时解剖自己，严密防范着文人精神在自己身上抬头。至于在周作人这类现代知识者身上，文人精神则终于表现得十分充分。周作人的变节事敌，其实还是传统文人的极端冷漠和自私所致。我甚至认为，顾城的杀妻，不过是中国传统的文人理想破灭所致。顾城的杀人与自杀，与所谓“形而上的痛苦”或许并不相干。

在中国古代，文人阶层虽与正統的士大夫阶层相对而存在，但二者却并非水火不容，毋宁说是一种互补关系。文人阶层是士大夫阶级的退路。所谓贤良方正之士，所谓正統士大夫，仕途失意时，或政治理想破灭时，便会很自然地流落到文人阶层，奉行起文人式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同样，原本混迹于文人圈里的人，如一朝时来运转，仕途得意，他也便摇身一变，贤良方正起来，成了正統的士大夫。所以，文人阶层虽常在，但其成员却是流动性很强的。

在中国古代，每当作为知识分子立身困难时，每当当时的社会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排斥和仇视时，便有许多知识者流落到文人阶层。而在今天，当知识分子面临危机时，当知识分子被“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所排挤时，传统文人精神在知识者阶层中的复活，便也是极易理解的了。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无师自通地、不知不觉地像传统文人那样生存起来。这种传统文人型的当代知识者，正生活得很有滋味，很安宁、平静。